

无棺椁墓室的契丹葬俗

“一代风俗始自辽金”。辽统治燕京之后，社会习俗对北京影响颇大。在葬俗上，契丹多采取树葬及火葬。由于契丹是游牧民族，人死后，有归葬草原内地的习俗。

公元 10 世纪至 12 世纪，散居在辽河西岸、长白山下的契丹族各部落，聚集在威振四方的军事首长耶律阿保机及其后裔的大旗下，东掠西征，北伐南侵，金戈铁马直逼淮水之滨，使宋王朝的八代君主常常坐不稳金銮殿。契丹人在我国古代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各个舞台上活跃了 200 余年，便迅速失去了踪迹，完全融合在中华民族这伟大的躯体之中了。

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，其社会习俗多沿袭本民族的旧制，统治燕京后，习俗有所改变，就葬俗而言，也开始与汉族有所结合。

契丹人早期丧葬无棺椁墓室，而多采用树葬及火葬。《隋书》载：

“(契丹)父母死而悲哭者，以为不壮，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，经三年之后，乃收其骨而焚之。因酌而祝曰：‘冬月时，向阳食。若我射猎时，使我多得猪

鹿。’其无礼顽器,于诸夷最甚。”

契丹建国之后,接受汉文化,帝王死后亦有棺槨陵墓,所以自辽太祖阿保机起,便有陵寝,祖陵规模的宏伟已证明了这种转变。此后贵族们纷纷效仿。但从目前发现的辽墓看,契丹人的葬俗仍很不一致。有的有棺,有的仅有尸床,也有的行火葬。尤其是下层人民无棺或火葬者居多。

契丹人死后,一般归葬草原内地。所以,至今北京地区所发现的辽墓,都是汉人墓葬。当时幽燕地区实行的自然是汉人的传统葬俗,但墓葬形式也吸收了不少契丹习俗。尤其火葬较中原内地为多。

从墓室看,有单室墓和多室墓。北京南郊养鸭厂出土的赵德钧墓,是多室墓中最典型的一座。其墓全部用沟纹砖砌成,用以砌造斗拱和门楣的还有特制的雕砖。整个墓分前、中、后三进,每进主室两侧都各有一个耳室。墓室平面皆为圆型,上部为覆盖式,这是北京地区辽墓的共同特点。整个墓共九室,九室各有分工,反映出墓主人在世时的各种生活场面。前中室似厅堂,右前室有灶,灶上置铁锅、石锅、玉碗、铜勺等,看来是间厨房。中室尸骨所在,其中一人为火葬。左后室发现大量铜钱,还有木箱,似为钱库。右后室发现大量绿色有机物,可能是腐烂的粮食,若是,这里则是仓库。各室多有壁画,大多已残毁,个别部分保存完好。这样复杂的形式,巨大的规模,充分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的高贵地位和奢侈

的生活。

北京在 1954—1957 年间,曾清理过九座单室墓,多为圣宗以前墓葬,其砌造方式大体与宋制相同,只是墓中出土有典型的契丹器皿鸡冠壶等。

北京辽墓中比较特殊的发现是马直温墓。此墓位于大兴县西红门东。墓中出土了两具大型活动关节木偶人,系墓主人的真容雕像。男像以柏木雕成,高约 1.4 米,全身由 17 个部件组成,以合槽、暗榫、转轴套接、明插榫、单榫等形式相连接。胸腹用一段圆木凿为盒状,背部木板可以掀开,是装骨灰之处。两臂可向前摆动,下臂转动灵活。大腿及足亦可活动。这种真容像的葬法仅在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中发现过,可能是燕云地区特殊的葬俗。两个木像当初可能均着巾帻和衣物。契丹多火葬,棺葬者常使用铜面具和铜丝网络,其外再着衣物。马直温夫妇皆为火葬,便以真容像代骨灰盒,其外着衣饰。从中亦可以看出契丹与汉族葬俗是如何结合的。

丧葬极简的女真族

女真族的原始丧葬极其简单，人死后大都土葬，且没有棺槨。而葬俗中的“烧饭”，与汉俗是大大有别的。由于受汉族葬俗的影响，女真人的丧事也开始讲究排场。

女真族是中国历史上东北部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。他们自五世昭祖石鲁开始，以法制、国俗统一了女真部族。

随着他们内部的统一和强大，便开始定国号，“大金”国号确定之后，他们便对辽朝宣战，灭辽后，迁都燕京，开始与汉族进入了相互影响时期。其丧俗就受到燕京地区葬俗较大的影响。

女真族原始丧葬极简，“死者埋之而无棺槨。贵者生焚所宠奴婢、所乘鞍马以殉之。所有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，谓之‘烧饭’”。这与汉俗有别，但有殉葬制。女真奴隶主将奴隶活活烧死焚尸入殉，也与汉族殉葬有所差别。

中都地区在辽代就盛行火葬习俗。火葬的来源，一是契丹族人在其父母死后“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，经三年之后，乃收其骨而焚之”。二是佛教。到

金代，火葬的习俗在中都地区广泛流行。1949 年以后，北京地区发掘的一些金代墓葬，死者多为火化，如 1975 年 8 月在通县发现的石宗壁夫妇合葬墓，1980 年在丰台区发现的四座乌古论家族墓葬等，都是火葬。但金王朝的上层贵族死后也用土葬，如 1974 年北京市房山区长沟峪发现的一组金代石椁墓葬，椁内有金漆木棺，棺内有人骨。房山长沟峪正是金朝皇陵区域的‘鹿门谷’诸王兆域，所埋葬的都是亲王、郡王等亲贵，如海陵王被废为郡王后即葬在此，后被贬为庶人，才迁出鹿门谷。

中都地区金代贵族墓多为石椁墓，如前述通县发现的石宗壁及其家属的两墓，就是外用石板制成的石椁，内放骨灰盒。长沟峪墓是外用石椁，内有木棺。木棺制作考究，用红柏木板制成，长方盒形，外涂红漆并用银钉嵌鑿花银片。棺前图案为四角云纹，中嵌火焰宝珠。棺两侧的图案是四角云纹，中嵌一条飞舞的云龙，形象生动。丰台区乌古论墓的石椁是由四块完整的青石板组成，底、盖均为三块青条石，内有棺床，床上放木棺，内有骨灰。乌古论家族墓地的另一座墓的石椁，则四壁、底、盖都是用一块石板构成，内也有石板棺床，床上有零散骨灰，可能是木棺已朽。

金中都后期，城市经济有了较高的发展，城市生活侈靡，反映到丧葬上是讲究排场和糜费。据元初人的记述，中都城居民办丧事时“无问贵贱，多破钱

物,用纸作房室、侍从、车马等仪物”。这个记述虽是元初的现象,但作为习俗,应该是早已形成,亦即金中都时就形成了这种社会风气,显为受汉族传统习俗的影响,也反映出中都民族习俗的相互融合。

神秘的元、明丧仪

元时京城，是蒙古人的天下。蒙古人的丧葬神秘而隆重，“萨满”巫师必须祈祷灵魂安宁。明时丧葬以土葬为主，兼行火葬，且丧事喜办也开始萌生。

元朝，是蒙古人的天下。

蒙古人的丧葬之俗带有更多的神秘性。特别是蒙古贵族死后，葬礼十分隆重。首先，人们要在死者生前选定的地方掘一大坑，将死者用过的一座毡帐放入坑中，然后将死者安放在毡帐里。毡帐内备有死者生前惯用的各种日常用品，食物、饮料、坐骑、车辆等也一应俱全，以便供其在另一个世界享用。然后，对那些和死者共同居住的亲属、侍从等人进行火净的仪式，帮助他们消灾解难。而蒙古族的“萨满”巫师，必须经常为死者举行各种祈祷仪式，这既是为了祝福死者的灵魂得到安宁，也是希望死者能给他的后人带来幸福。死者安葬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墓地四周都有士卒把守，不许他人走近，直到墓地长出青草，和周围已无区别为止。

蒙古统治者进占中原后，虽然承袭了以前历代

封建帝王的大部分政治措施，但是惟独没有承袭前代帝王设置陵寝的作法，而是沿用蒙古族的旧风俗。自忽必烈开始，每当诸帝死后，先是用大圆木一剖为二，中间挖成人形空槽，然后将死去帝王安置其中，再将圆木合好，外面用金条作箍，束好之后，拉回漠北草原安葬。故而大都地区，在此以前的金代诸帝有陵墓，此后的明、清二代帝王亦有陵墓，惟有元朝诸帝未建陵墓。

蒙古统治者因为在大都未设陵寝，但是又要四时对祖先进行祭奠，于是在大都的蓬莱坊南专门设置了一处祭祀场所，称“烧饭园”；并请蒙古巫师“萨满”来主持祭奠活动。“每祭，则自内庭骑从酒物，呵从携持祭物于内，烧饭师婆（即萨满）以国语（指蒙古语）祝祈，遍洒酒物。以火烧所祭之肉，而祝语甚详”。由此可见，其葬礼和祭祀方法，仍然沿用蒙古族旧俗。

大都地区民众办丧事，其规模与婚事略同。人死后，家中先要请僧人前来念经。买到棺材后，放于门口，一两天后，才将死者送到附近城外寺中停放。其后由人负责火化。而死者的众多亲属聚在一起，大吃一顿。死者火化后，将骨灰埋于城郊坟地。家中岁时行祭奠之礼，因为当时大都火葬十分流行，故而受到一些遵行汉族传统“礼法”的官僚的非议，认为“习既成风，恬不知痛，败俗伤化，无重于此”。然而风俗已成，元朝政府又未明令严禁，故此俗一直

沿习到元末。

明代北京是以土葬为主，兼行火葬。北京地区流行火葬大体始于辽。在北京已发掘的辽墓当中，曾发现火葬，是火化后又将骨灰葬入的可观的大型坟墓。这是北方民族与汉族习俗融合的结果，当时在汉族中尚不普遍。元大都时，火葬较为普遍地在北京流行。所以明代仍是火葬与土葬并存。一般说，大户人家是土葬，而贫困市民多用火葬。可见，火葬所以在北京流传，一是北方民族的影响，二是由于北京信佛教的人很多，佛教提倡火化，三是与当时城市人口急剧增长，土地有限有关。所以，连皇室宫女死后也用火葬。

沈榜评价当时北京地区的葬礼“敛称家有无，殯不逾时，哭哀而不文，皆有古意”。当然，在富贵人家也有相当奢侈的，“饭僧焚修，费动百千，冥器、幡幢照耀数里，随椁封树比之陵寝”；然唯有力者为之，他不然也”。一般百姓发丧三日，门前首先挂出丧牌，写明死者的寿命年月，并请阴阳家推算“煞神”所在之日，举家避之他所，称作“躲煞”。葬后三日到坟墓祭奠，称作“暖墓”。至于富家讲究则很多，排场也很大。有时，一丧车有百人舁之。铭旌有高五丈者，用上百匹锦帛制作。当时北京亦流行纸糊方相，即今河北省所称“纸扎”，作纸人、纸房。有的办丧事常请优童演跳竿、走马等百戏。孝帽顶心系红绒一朵，叫作“花花

孝”。从这些习俗看出，明代北京丧俗虽不像南方那样“丧事喜办”，但亦有庄周鼓盆之意，从中看出北方少数民族对这个地区深远的影响。

明万历皇帝陵寝及葬仪

万历皇帝陵寝，建造在大峪山与蟒山两山主峰之间，堪称建筑史上的杰作。万历皇帝的葬仪声势浩大，葬于皇帝身边的皇后，还有一段秘闻。

明隆庆六年(1572年)五月二十六日,明朝的第12代皇帝,刚刚36岁的朱载堉崩于乾清宫。

六月十日,皇太子朱翊钧登极,此时年方10岁,以翌年(1573年)为万历元年,开始了长达48年的统治。

万历八年(1580年)三月,不满18岁的万历执政后第一次到天寿山谒陵时,就开始考虑建造自己的陵寝了。至十一年春,万历发布谕旨:“朕于闰二月躬谒天寿山,行春季礼并择寿宫。”

是年二月四日,礼部、工部首次派遣陈述岭等人赴天寿山先行勘测,选择‘吉壤’二三处,以便于皇上在谒陵过程中钦定。

陈述岭一行于二月十四日返回北京。第二天礼部向皇帝呈奏了他们的选择方案和图示,认为永陵东边的潭峪岭,昭陵北边的样子岭,东陵南边的勒草洼,俱为吉壤。

万历皇帝鉴阅之后，急命定国公徐文壁等再去核勘。二月底，徐文壁等人回京，向皇帝呈奏：“三处地址确为吉壤。”

三处俱吉，自然不能俱用，只能从中选择一处作为寿宫之地。而这个选择，只能由皇帝自己钦定。于是，万历决定在闰二月十二日第二次“谒陵”。

闰二月十六日，万历率队到祥子岭、潭峪岭、勒草洼三处详细察阅后，却对三处地址皆不满意。万历回宫后，立即谕令礼、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，再去选择二处来看。

礼、工二部重新组织人马，紧锣密鼓地赴天寿山再择“吉壤”。此次认为形龙山、大峪山、石门沟山三处“最吉”。

九月六日，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，率后、妃进行第三次谒陵。经过反复比较之后，谕旨内阁：“寿宫吉壤，用大峪山。”

十二年九月十三日，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、妃进行第四次谒陵。十六日，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。两宫太后也一致认定大峪山为“最吉”。

十月初六卯时，大明神宗显皇帝朱翊钧的寿宫，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。

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，于是便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专门机构。成员有尚书三人、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，定国公徐文壁、内阁道辅申

时行总管建造事宜。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，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。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，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，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。

在这之前，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“规制尽美，福祚无疆”。

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的寿宫。因他在位长达 45 年，陵寝也是在生前预建，所以规模较大，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。永陵陵院长度为 289.2 米，宽 149 米；宝城坟墓面积为 51687.2 平方米，陵院面积为 41170.8 平方米；不计外罗城的总面积为 92858 平方米。而万历的定陵陵院长度为 317.5 米，宽 150.3 米，宝城坟墓面积为 41526.5 平方米；陵院面积 42935.9 平方米；不计外罗城的总面积为 84462.4 平方米。

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 8395.6 平方米，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 1765.1 平方米。因而，今天的观光者，假如有心把永、定二陵作一比较，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，这充分反映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。

既然按照永陵建制，花斑纹石自不可少。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，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，当时仅在徐州和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。这种岩石，虽然五颜六色光彩灼目，但却没有纹

绉,质地坚硬,雕琢十分困难。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,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,其费工耗时之状,可以想象。定陵所用花斑纹石做工极细,《帝陵图说》形容其“滑泽如新,微尘不能染”;“光焰灼人”。

定陵自万历十二年(1584年)十月六日开工,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人。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,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。

定陵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,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。这里地处黄河下游,又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路,土质优良丰厚,交通便利,是制砖和运输最为理想的地方。自黄土高原流失下来的粘土,经过千里浪淘淤积到临清一带,已经变得质纯无沙、细腻无性。首先将泥土挖出晾晒,然后经过过滤、浆泡、摔打、制坯等多种工序,最后才烧制成砖。这种砖长0.49米,宽0.24米,厚0.12米,重48斤,抗压系数大,质量极高。为便于检查,每块砖上都打有窑户、匠人、年月等标记。查验不合格者,一看标记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。因为砖色灰白,故称白城砖。早在万历二年(1574年)四月,此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,但已开始谕令临清各窑,每年为皇家烧造白城砖120块。

除临清之外,河北省武清县也曾烧制白城砖。武清县烧制白城砖始于万历二年(1574年)九月,隆平县民王勇上奏说:“今有武清地方,土脉坚胶不异

临清。去京仅一百三十余里,较临清近两千余里,一改兴作,不但粮船、民船不苦烦劳,抑且为国节省,有生财实效。’经工部核议,令武清年烧造 30 万块。自定陵动工后,两地的烧造数量又有大幅度增加。

除白城砖外,还有供殿堂铺地方砖,它只产在江南黄州。其烧造工艺比白城砖更为复杂,需浆泡数年,筛数次,温火烧成,犹如河中淘金,故有‘金砖’之称。其质地之细腻,砖面之光滑,为世上少有。可惜因工艺失传,今天再也无法烧制了。

砖料的运输,多采用囚犯专职从事。除此之外,活动在大运河中的粮船、商船也义务为工地带运。在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内,无论是专职为皇家运粮的漕船,还是商贾民人的私船,只要通过黄州和临清,都要为皇家带运一定数量的砖料。到达京东通州以后,再由车户走旱路运往天寿山。万历十二年十二月,工部郎中何起鸣,陈请在夏季水涨季节,将砖料直接运往小汤山以南或沙河朝宗桥以东。由此以来,城砖运输就从京杭大运河的北端一直伸延到了沙河巩华城下。

定陵所用巨石,大部分来自京南房山县大石窝,主要有青石、白石、汉白玉等数种,在几十万块大石之中,最重的可达上百吨。如此大的巨石,给运输带来极大的困难。因为石源来自山区,只能采取旱路运输。修建永陵时,巨石全由旱冰船进行人工挽运。其方法是每隔一里之遥,在地下凿一深井,冬天到

来,将水打出,泼在路面冻成冰被,巨石沿冰路滑行,到达天寿山。当时从大石窝往京师运送长 3 丈、宽 1 丈、厚 5 尺的一块巨石,就需要民夫 2 万人,用时 28 天,耗银 11 万两。如果运往天寿山,其人力、时间、耗资还需再加一倍。至嘉靖十六年(1537 年),工部尚书毛伯温,针对旱冰船拽运耗财、费时、费力,又受季节和气温限制的弱点,特地令工匠试制出八轮大车。此车不仅可以用骡马代替人力,节省财力和时间,而且相当安全可靠。后工部郎中贺盛瑞又在八轮大车的基础上,进一步试制出十六轮大车,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。但尽管如此,其开采运输之艰难,仍为世间罕见。

由于定陵屡遭焚烧,大殿荡然无存,今天的观光者已无法从中领略木料的珍贵与风采。但从长陵祔恩殿现存的 60 根楠木大柱中,仍可想象定陵初建之时,所用木料该是何等气度。

定陵大殿多采用金丝楠木,主要产地在湖广、云贵和四川诸省。此木料质地坚硬,耐腐蚀且有香味,是明代皇家建造宫殿庙坛的主要用料。除此之外,此木的珍贵主要还在于它的稀少、高大和成长的缓慢。这种树木原本零星地散诸于原始森林,随着采伐量的逐渐增加,能够利用的楠木大材只剩‘穷崖绝壑,人迹罕至之地’了,不仅难于攀登,而且有毒蛇猛兽、瘴气蚊虫,砍伐极为困难。定陵所需用的楠材大木,共计 2 万余根,最粗的直径可达 1.4 米以上。要

采伐一根大木，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。

当木夫将楠木砍倒之后，便沿着行进路线先行修路。先由人工将巨木拖到江河之滨，待水涨季节，将木掀入江河，让其漂流而下。在这漩涡急流、惊涛骇浪之中，又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丧生。

和砖石木料相比，琉璃制品的制作和运输最为省力和方便。定陵所需用的琉璃制品，比其他陵墓的数量都多。出于建筑艺术的需要，宫墙与殿宇除常用的琉璃瓦、脊兽等以外，陵门、享殿等重要建筑，全部用带有山水、花卉、龙凤、麒麟、海马、龟蛇等图案的琉璃砖进行装饰，不仅辉煌壮观，而且比其他陵园又增添了一份瑰丽和华美。

这些琉璃制品主要产在京师。先把陶料粉碎，经过筛罗、合泥、制坯、烘干、上釉，最后以高温烧制而成。现在北京的琉璃厂，早在元代就是窑址，明永乐年间又在此处设厂，专为皇家烧造琉璃制品。因此这个厂址名称与工艺一起一直流传至今。

定陵虽然按照永陵的规制建造，但它却在总体上超过了永陵。整个陵园显得比永陵更为壮观深邃，花斑石的用量及装饰都大大超过了永陵。从永陵与定陵两个祔恩殿残存的柱础分析比较，定陵使用的楠木大桩比永陵使用的还要粗大。而定陵的梁椽之坚固，砌石之重厚，做工之精细，装饰之华美，不仅永陵无法相比，就是在整个明代的陵墓中也无与之匹敌者。